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编辑部编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80×1230毫米 32开本 4.5印张 90,000字
1980年10月第1版 1980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00,000

书号 3230·3 定价 0.40元

内部发行



出 版 说 明

为了配合目前干部学习党中央对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我社征得姚依林、薄一波、薛暮桥、杜润生等同志的同意，将他们在中共中央党校所作的报告编印成这本《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本书各篇内容，均经原报告人审阅，有的还作了重要补充。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系内部读物，仅供县、团以上干部学习参考，请不要公开引用。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九月

目 录

关于经济工作的几个问题	薄一波 (1)
一、三十年来经济建设的回顾	(1)
二、国民经济的调整	(31)
三、经济体制的改革	(44)
四、利用现有物质基础,引进外资和技术	(50)
五、人才的培养和使用	(56)
关于制定长期计划的一些初步认识	姚依林 (63)
一、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	(63)
二、如何“对症下药”	(69)
三、扬长避短,发挥优势,保护竞争, 推动联合	(82)
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的改革	薛暮桥 (89)
一、社会主义经济的多种经营形式	(89)
二、扬长避短,发挥优势	(96)
三、保护竞争,促进联合	(100)
四、建立经济中心,发展跨省公司	(107)
农业问题	杜润生 (112)

关于经济工作的几个问题

——一九八〇年一月十五日在全国
党校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薄 一 波

同志们：

今天，就有关经济工作的几个问题，主要是对三十年建设的历史，讲一点自己的看法。不对的地方，和大家共同商讨。

一、三十年来经济建设的回顾

关于新中国三十年来的发展，叶剑英同志在去年的国庆讲话的第一部分中，作了总的回顾。许多重要的问题，他都讲得很透彻了。这里，我主要是从经济工作的角度、经济发展的角度，来回顾过去的三十年。三十年的经济建设是在比较大的曲折中前进的。大体上来说，经历了四次转折和四个阶段；加上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把工作着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次大的转折，就是五次转折。三十年，五次转折，四个发展阶段。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时期。党的工作重点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由革命战争转移到经济建设。这是一次伟大的转变，是我国革命发展史上极为重大的里程碑。从经济发展来说，这是第一次转折。

从这个时候开始的三年经济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是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在这个发展阶段内，我们做了不少很有成效的事情。我们实际上用了不到三年的时间，就医治了长期战争遗留下来的严重创伤，制止了通货膨胀，使财政经济状况有了根本好转。当时，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陈云同志主持财经工作。毛主席对这一段的财经工作有过很高的评价。记得在一九五二年，有一次我向毛主席汇报说，我们的经济恢复工作已经完成。毛主席听了很高兴，特别称赞陈云同志，说他很能干，有理财治国的才能，在延安对还没有完全看出来。毛主席一边说，一边写了一个“能”字。

经过三年恢复，很快地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从一九五三年、一九五四年起（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从一九五三年算起的，但计划是一九五四年制定出来和正式执行的），以苏联援建的“一五六”项限额以上工程为中心，展开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只用了四年时间就完成了。我在这里着重说一句，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毛主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直接过问和听取汇报，由陈云同志主持、富春等同志参加搞出来的。我还要补充说一句，斯大林同志在这个时候帮助了我们。“一五六”项工程就

是当时的苏联共产党、斯大林帮助我们搞出来的。回忆我国经济建设历史的时候，要想到斯大林。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我们不能忘记斯大林对中国革命和建设是有过帮助、有过贡献的。总的来说，第一个五年计划，在斯大林的帮助下，经过我们自己的努力，是安排得比较好的，是经过综合平衡的。那时有个口号，叫“优先发展重工业”，我们对优先发展重工业，在理解和执行上都是正确的。当时我们考虑到，如果没有重工业的优先发展，农业、轻工业、交通运输业、国防建设就得不到必要的、急需的装备和原材料，就发展不起来。那样，我们就会犯“软骨病”。在实际执行中间，我们部署了钢铁工业；同时部署了装备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机械制造业；部署了燃料动力工业，那时和重工业部平行的，专门设置了燃料工业部。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那个时候也是比较注意积累和消费的合理比例；比较注意重、轻、农的协调发展；在基本建设中，比较注意“骨头”和“肉”的关系。当时能搞出这么一个好计划来，是很了不起的事情。有人提出，那时我们搞计划的知识不多，也没有搞过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怎么还能搞出那样一个比较好的计划来呢？这件事确实值得很好地想一想。不过，也没有什么“秘诀”，最基本的原因，就是当时是切实根据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办事的，实事求是，从实际情况出发，特别注意了综合平衡。三年恢复了经济，随后又顺利地实现了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同时用了不到四年时间就完成了五年计划。经济发展的速度是快的，蒸蒸日上，社会风尚是好的，人民生活也是逐渐提高的。现在，不是还有许多人怀念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斯

吗?!当然，大家怀念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是说经济的发展比较正常，也不能说那时一切都搞得很好。

这是国民经济的第一个发展阶段，是开始为社会主义奠定物质基础的重要阶段。

(2) 一九五六年，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开始了第二次转折。这里说明一下，我讲的“转折”，是按照历史走过的脚印来说的；我们通常讲“伟大的转折”，这里不是从那种意义上说的，从实际的情形看，它确是转折，但不一定是伟大的。经济发展的第二次转折，情形比较复杂。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现在来看，这是个关键的时刻。一九五六年初，毛主席着重提出，我们要找出合乎我国具体情况的经济发展的道路，使我们的经济建设搞得多一些，快一些，好一些，省一些。有名的“多快好省”，就是这时开始提出来的。这一年的春天，刘少奇同志找工业交通部门的负责人，最早找的是轻工业部门的负责人汇报、座谈，研究我国经济发展的道路。少奇同志提出许多意见，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关系问题提出来了，沿海和内地的关系问题也提出来了，在工业生产建设方面战时和平时关系问题也提出来了。我有一次向主席汇报工作时说，现在少奇同志在那里主持一些工业部门汇报。毛主席说，这很好啊！你也给我组织一下，我也很想听一听。在随后的两个多月内，毛主席亲自听了有关工业、运输业、农业、商业、财政等三十四个部门的工作汇报。这是我们搞建设的历史上有名的“三十四个部门汇报”。毛主席那时工作得很紧张，他自己说，一天就是床上地下，起了床就听汇报，听了汇报就上床休息。毛主席认为这些汇报很好。这是一次

重要的调查研究。边汇报、边议论，总结了经济建设的经验，反对了教条主义，反对了我们在学习苏联经验的过程中硬搬那些不适合中国情况的东西，明确了适合我国情况的经济发展的指导方针。听了汇报以后不久，毛主席先是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后来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报告。直到现在，这个报告还是对我们工作起重大指导作用的文献。

那对候，在我们的中央，毛主席、刘少奇同志、周总理、陈云同志都是亲自出马，由毛主席总其大成。从“三十四个部门汇报”到《论十大关系》，可以看出：毛泽东思想既是毛主席个人智慧的产物，也是他的战友们、党和革命人民智慧的产物。毛泽东思想是集中了全党和革命人民的智慧，集中了党中央领导同志的智慧，而不仅仅是毛泽东同志个人的杰出的思想。毛主席生前就一再说过，他的书不是他一个人写出来的。当然，在我们党的领袖中，毛泽东同志是最杰出的，是他把大家在集体的革命奋斗中产生的先进思想集中起来，综合起来，加以发展，作出伟大的贡献，所以才叫毛泽东思想。

一九五六年八、九月间，召开了“八大”，确定以后党的主要任务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希望党校的同志把“八大”的报告再研究一下，看看那上边的提法有什么问题？我认为，今天看来，那仍然是个正确的、很重要的文件。“八大”的政治报告是刘少奇同志代表党中央作的。现在中央正准备给少奇同志恢复名誉，不久就将正式做出决定。三顶“帽子”报本不能成立，完全是强加

的。刘少奇同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一生，是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生。“八大”的报告提出党的工作着重点的转移问题，提出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旧的生产关系已经改变了，成为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了基本的胜利；可是，我们的生产力还很落后，很不适应，所以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上。这实际上也是革命。革命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个观点有什么错误呢？可是，那个自我吹嘘的“理论家”陈伯达、康生反对，说这是“唯生产力论”。从这以后，把刘少奇同志集中全党的智慧提出的这个观点打“垮”了，结果是我们党倒霉、受害。

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还通过了周总理主持编制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这个好建议后来并没有组织实行，被放在一边了。毛主席后来在《十年总结》里还专门讲到：一九五六年恩来同志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给我们留了三年的余地，多么好啊！就在一九五六年这一年，正式提出了“多快好省”的口号，后来发展成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一九五七年，毛主席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提出了重要的指导原则。这次转折，出发点是想寻找适合中国情况的经济发展道路。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经济的发展也是比较正常的、健康的。对这两年的工作，今天大家都认为是做得相当好的，是被照毛泽东思想办事的。

可惜的是，后来毛主席决策的一些重大事项，违背了他

自己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原则，造成了不好的后果。回想起来，一九五七年的下半年，就出问题了。大约在十一月莫斯科会议上，苏联提出个口号，叫多少年在生产上赶上美国，毛主席在那儿就提出，那我们就找个英国来赶超吧，于是提出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英国。这个口号，现在看来也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在具体工作的部署上，着重是赶英国历史上钢的最高生产水平二千二百万吨。实际上，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就转向“以钢为纲”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也应当作自我批评。在一九五六年，毛主席亲自主持搞了个农村工作设想的“十七条”，以后发展成为农村工作的“四十条”。那时我主管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工作。一九五八年六、七月间毛主席对我说：现在农业已经有办法了，办法就是“以粮为纲，全面发展”。“以粮为纲”，带动其他，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我现在就是要拿农业来压工业，农业的问题解决了，你工业怎么办？毛主席的意思，是要我把一九五七年提出的赶上英国钢的最高年产量二千二百万吨的口号具体化。我没有多加思索，就回答：那工业就是“以钢为纲”，带动一切吧。毛主席说：对，很对！就按照这个办。于是，就把这个口号拿出来了。今天检查，这个口号不对头。我有责任。实践证明，以钢为纲，并没有带动一切，也带动不起来一切。相反，执行的结果，挤了轻工业、农业，按了文教，特别挤了城市建设和人民生活，也挤了煤、电、他、运和其他。一九五七年，我国钢的产量已经这到五百三十五万吨，比一九五二年的一百三十五万吨，增加了三倍，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三十一，这确实是个很大的成绩。

冶金工业部那时是王鹤寿同志担任部长，工作做得好。毛主席称赞他工作有成绩。到了一九五七年下半年，那时我主持国家经济委员会的工作，管工业、交通兼管年度计划。在编制一九五八年计划的时候，毛主席就提出能不能再快一点？一九五八年钢的指标原来定为六百二十万吨，比上一年的五百三十五万吨增加八十五万吨，增长速度可以说是相当快了。后来我们算了一下，如果按这个速度前进，中间不要有什么大的波折，大体上到一九六六年，就是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国钢的产量可以达到两千万吨左右，就可以实现在莫斯科会议上提出来的十五年赶上英国的目标。这里应当提到，一九五七年我们党内发生了冒进和反冒进的争论。同志们记得，那时国民经济的发展出现了“马鞍形”，就是说一九五六年生产的增长速度是高的，一九五七年低下来了，一九五八年要把它搞上去。一九五七年为什么低了？说是“右倾”了，几位同志反冒进了，于是就搞了个反反冒进。到一九五八年一月，在南宁会议上，大批反冒进。当时提出的有些口号，离开了第二次转折开始时提出的正确原则。总的来说，第二次转折，原本是寻求经济建设的自己的道路，愿望是好的。起初也转得很好，是马克思主义的。如果循序渐进，大有可为。但是不满足这一点，到一九五八年，再加劲，超越了真理，就转歪了。这就造成了以后一个期间我们工作上的很大被动。这算是第二次转折。

从一九五八年开始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包括大跃进、三年困难，可以算作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前面说过了，这个阶段是在不那么正常的状态中开始的。南宁会

议以后，“反右倾”一浪高过一浪，似乎指标高，“快”，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量力而行的指标，“慢”，就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在一九五八年三、四月召开的成都会议上，提出“拔白旗，插红旗”，“白旗”就是指那些主张指标比较稳定的。会后，又提出反对“稳妥派”。顺便说一句，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的这些决议，我当时没有任何怀疑，是坚决执行了的。一九五八年四月，提出钢的产量翻一番，不是六百二十万吨，要求达到一千零七十万吨。五月，在八届五中全会上，继续反“右”。后来，在北戴河会议上，决定组织人民公社，当年搞七千亿斤粮食，还正式提出“以钢为纲”，把“一〇七〇”写到公报上。在“一〇七〇”问题上，我也负有一份责任。对“一〇七〇”，我本来是有怀疑的，但许多人都说行，我也大概算了一下，并没有细算，觉得有这么高炉，这么多平炉，那么多矿山，那时又强调算活账，算大账，反对见物不见人，这么一算，也觉得行。于是，在北戴河会议上，我把鞍钢、武钢、太钢这些大钢铁厂的党委书记、厂长和这些大钢厂所在地的工业书记都叫上，去毛主席那里开会。大家去了一谈，都说钢产量可以翻番。有几位地方上的负责人极力主张翻番。毛主席很高兴。我心里不踏实，怕完不成，就向毛主席建议把“一〇七〇”写到公报上。毛主席赞成。当时我就通知起草公报的胡乔木同志，说毛主席说了，把“一〇七〇”写到公报上。我的意思是，大家都这样主张，就得大家负责任，写到公报上有“将军”之意。事实证明，我的这个建议是错误的。一九五九年在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同志的时候，毛主席第一句话就说：我犯了一个错

误，接受了薄一波同志的建议，把“一〇七〇”公布了。应当说，在北戴河会议上，毛主席对“一〇七〇”是有过怀疑的。他引用了一句古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因为那时已经到九月份了，钢产量还不到“一〇七〇”的三分之一，离年底不到四个月，还有三分之二的任务能完成吗？但是，还是下了决心，定了纪律，要保证实现。于是，六千万人上山，全国各地都动员起来大办钢铁。

那时候，我们的经济工作发生了许多不正常的现象，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等等，许多唯心主义的东西泛滥起来了，严重违反了客观规律。比如“吃饭不要钱”，这是柯庆施同志提出来的口号。他说：饭有的是，不吃掉怎么行！当时甘肃的省委书记告诉我，有的干部执行这个口号很积极，看到过路人走了多远，还强拉他回来，说天晚了还不吃饭？反正不要铁，非要叫他吃不行。还有，叫做“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唯心主义到了什么程度啊！还有，叫做“大破资产阶级法权”，这是柯庆施让张春桥写的文章。如此等等。从工业、交通战线来说，原来提十五年或看更多一点时间赶上英国，不久就改为十五年或者更少一点时间，过几天又改为十二年，再过几天又改为十年。后来，索性说只要大家努力，一两年就能赶上。为什么一九五九年、一九六〇年钢的生产指标总想搞到两千万吨？就是想很快赶上英国。

总之，南宁会议以后一下子就把风吹上去了，吹到了极端，“左”了，“左”得很，发生了许多问题。

但是，应当公道地讲，是毛主席首先提出要纠正高指

标、瞎指挥、共产风等等的。纠正的时候也是非常紧迫的，会议一个接着一个。在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初，开第一次郑州会议，集合了一些省市书记和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开始解决这类问题。在这次会议上，着重讲了要发展商品生产和利用价值法则，提出了读两本书的建议，一本是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是《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十一月下半月，开了武昌会议，也是解决这类问题。毛主席说：“一〇七〇”是个冒险的计划，六千万人上山，别的都让路，搞得很紧张。他主张把一九五九年钢的指标压下来，把计划放在可靠的基础上。还讲了要用两个月到半年整顿人民公社。一九五九年二月开第二次郑州会议，着重解决人民公社的所有制、按劳分配和“一平二调三收款”的问题。四月开上海会议，议论了多谋善断、留有余地、实事求是和波浪式前进的问题，反对少谋武断、脑子僵化、计划留缺口和天天搞高潮。记得当时毛主席拿出一本《三国志》说，这里有一篇《郭嘉传》，郭嘉是曹操的一个很好的谋臣，能够多谋善断。还提出了要解放思想，坚持真理。上海会议后，中央指定陈云同志调整钢产量指标。陈云同志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把钢产量定为一千三百五十万吨。执行的结果证明，这是切合实际的。总之，这个期间开的会，都是类似性质的工作会议，直到六月上庐山，都是纠正冒进的错误，毛主席亲自主持纠正这种“左”的错误。毛主席对一些主持财经工作的同志讲，现在不能再支持你们了；还说，过去大家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大家的冒进。提出要“压缩空气”，劳逸结合，冲天干劲要和科学态度相结合。我记得在武昌会议上，

还讲到真老虎、纸老虎问题，说重要的是我们当前遇到的是真老虎、铁老虎，啃不下来，硬是啃不下来。应当说到，毛主席无论是在郑州会议上，还是在上海会议上、武昌会议上，都主要是从正面引导，对南宁会议后提出的那些不切实际的东面，并没有切实进行批评。而且，在纠“左”的方法上，毛主席不主张公开反“左”，不主张对那些特别热心执行“左”的方针的干部进行批评，反复讲“气可鼓而不可泄”，要保护干部和群众的干劲，强调公开反“左”是不对的，那是泼冷水、泄气，“人而无气，不知其可也”。经过一系列的会议，从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到一九五九年六月，有八个月之久，空气有一些“压缩”，但是劲头特别大的人们并不服气，思想上是否有所触动，很难说。

一九五九年六月下旬，庐山会议开始了。前半个月，开的是“神仙会”，继续“压缩空气”。毛主席检查了一年半来，许多政策执行的结果，成了“一条腿”。还指出：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是没有搞平衡，在整个经济工作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特别提到，是否要把重、轻、农的次序反过来，提农、轻、重。还讲：过去陈云同志提过首先安排好生产，安排好市场，其次再安排基建。现在看来，陈云同志的意见是对的。要把衣、食、住、用、行这五个字安排好，这是六亿五千万人民安定不安定的问题。前半个月，会议开得很好。但是在起草公根的时候发生了不同的看法。有人说公报草案没有表现出轰轰烈烈大办钢铁的群众运动面貌，没有明确提尽快赶上英国的口号，对形势估计“右倾”。于是，引起了争论。就在这个时刻，七月十四日，彭德怀同志提出了

有名的意见书。从内容来看，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并没有错误，里面讲的许多问题，跟第一次郑州会议到庐山会议前半段议论的内容差不多。他收集了一些材料，作了分析，更加明确地把这期间讲的东面肯定了下来，加了一句政治评语：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于是，极力提倡吃饭不要钱和主张“按劳分配是资产阶级法权”的人们站出来反对，说这不是“气可鼓而不可泄”。这样一来，就引起了一场风波。

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不但内容是正确的，而且在组织上他也没有错误。一个政治局委员给党的主席写信，提自己的意见，这有什么错误？就是意见有错误，也没有什么。但是整了他。所以，应该说对彭德怀同志的处理是完全错误的，现在不是给平反了吗？！毛主席说我们党内十次路线斗争。我看这次就不能成立，刘少奇同志那次也没有了。所以，我们党内在这问题上要好好总结一下。我在这里附带讲几句，这也是跟同志们商量研究问题吧。现在，我们党内有这样的情况：过去说毛主席正确，就说一切都正确，这是不对的；现在反过来，说毛主席有错误，那就仿佛一切都错了，也不能这样讲。现在给刘少奇同志平反了，给彭德怀同志平反了，是不是他们就一点错误也没有？恐怕还是一分为二，有点错误还是要讲有点错误，人要是没有错误，我觉得是不可能的。对彭德怀同志，我们都是很尊敬的。他当八路军副总司令时，实际上他也是个统帅，我们很尊敬他。他也有缺点，在庐山会议上他的态度也不是没有任何缺点的。他写了意见书之后说：在延安骂了我四十天娘，我现在骂你一天也不行吗？我这个意见书就是要刺他一下。这个态度恐怕不太好，不是